史 学 研 究

白银、性别与晚明社会变迁
——以徐霞客家族为个案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明代白银货币化深刻影响了社会变迁、国家转型和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历史进程,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同样,晚明社会性别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通过选取徐霞客家族作为个案,利用明末徐霞客收集、刻石的徐氏家族《晴山堂石刻》(现存 76 块,94 件诗文等士人名流墨迹),可以对于白银货币化影响下晚明社会性别的重塑、徐霞客的诞生,以及明末士人名流对于这种变化的认识作一初步探讨。尝试为探讨全球化开端时期白银货币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晚明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一种拓宽途径的新思路。

关键词: 白银货币化;社会性别;徐霞客家族;晴山堂石刻;晚明

中图分类号:K 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18)04-0092-14

明末徐霞客收集、刻石的徐氏家族《晴山堂石刻》(有拓本称《晴山堂法帖》,下面简称《石刻》)现存 76 块共 94 件诗文等士人名流墨迹。这里试图对其内容进行还原式剖析, 从实证层面揭示一个世家大族在晚明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变化——女性徐母作为纺织作坊经营者成为家族门户的主要支撑者,以及其子——明末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不同凡响的游历人生,并进一步探讨性别形象如何在当时男性士子话语中生成和得到评价。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晚明社会转型中社会性别发生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明末士人名流对于这种变化的认识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

一、明末“奇人”徐霞客及其时代

2017 年是徐霞客诞辰 430 周年。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晚明南直隶江阴马镇人。400 年前,他从科举鼎盛的江南走向了广阔的大自然世界,他的人生追求与众不同,他与他的《游记》被当时人称作“千古奇人”和“千古奇书”。[①]他持续三十多年,遍及当时 14 个省区(今天 19 个省区)的足迹,开了中国科学考察自然之先河;他的《游记》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他的旅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具有地理学的意义,也直接导致人们对自然产生新的认识,预示着文化的理性转变,可以视为晚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何看待徐霞客的诞生及其时代? 20 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盖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②]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丁文江、竺可桢、侯仁之等著名学者都曾撰文研究徐霞客与他的《游记》,迄今为止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侯仁之在《纪念作为时代先驱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中称:“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地理学家,最受现代学人的重视、因而不断就其生平学行进行深入探讨并广为传布的,莫过于徐霞客(1586—1641 年)”。[③]并

收稿日期:2017-11-20

作者简介:万明,女,江西九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① 钱谦益:《嘱毛子晋刻游记书》,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附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32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9 页。

③ 侯仁之:《纪念作为时代先驱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地理学报》1982 年第 3 期,第 236 页。

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后，除去对《徐霞客游记》的科学内容继续有所阐述外，十分显明的特点，是对《游记》产生的社会背景有所说明。任美锷总结徐霞客的科学成就："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来说，过去的地理书籍偏重于疆域、沿革、风土、物产的记述，而对于自然地理的现象，绝少涉及。到了徐霞客，则断然离开他的书斋，开辟了有系统的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这和他所处的时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有着密切关系的。"①其后关于徐霞客所处的晚明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代，在学术界已取得了共识，大都是以"资本主义萌芽"来解释和展开讨论，成果丰硕。在这里恕不一一列举。

进入新世纪，面临着转换研究思路、拓宽研究途径的问题。研究徐霞客，以往我们的社会变迁史研究显然忽略了性别问题。社会性别，英文名 Gender；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最早提出，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围群体、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等，是生物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主要体现在性别角色上，是一种文化构成物，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1985 年，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在《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的范畴》一文中，首次将社会性别范式运用到历史学研究领域，由此西方社会性别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至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这方面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改变了中国学者妇女史研究的面貌。②

社会性别差异，是指男女两性承担社会角色的差异。两性在社会中承担许多角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社会角色是高度性别分化的，其内含非常复杂。一般来说，在丈夫和妻子角色的差异中：妻子的角色使女性发生的变化，比丈夫的角色使男性发生的变化要剧烈，女性更看重和依赖于婚姻和家庭。丈夫最基本的责任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被看作是社会或家庭的栋梁，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一般认为女性只能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婚姻中的具有从属性。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指出："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的调查后，我们发现，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③但目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性别角色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男女两性所承担的主要社会角色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将性别的视角运用到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化开端、白银引发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晚明社会变迁成为一种新常态下，明末徐霞客家族可视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性别变迁的典型一例。

二、徐霞客家族与《晴山堂石刻》

对徐霞客家族进行性别解读和历史梳理，可以《晴山堂石刻》（下面简称《石刻》）文本④作为切入点。《石刻》在江阴市马镇乡南旸歧村徐霞客故居晴山堂内，此堂建于天启四年（1624），堂名取"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尚广转分明"之意⑤，是徐霞客为其母病愈而建，刻石因嵌于堂壁而得名。《石刻》共有 76 块，是徐霞客为庆祝母亲 80 大寿汇集的明代 263 年间 92 位诗文书法大家用隶、楷、行、草书体，为徐霞客及其先世所题赠的 94 篇诗文墨迹，字迹秀丽，刻工精湛，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价值。因此迄今为止以书法界的研究为多。实际上，其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是徐氏家族自明朝开始以来至明末的觞咏雅集活动聚集的名人诗文，是明朝士人社会交往的真实记录，为研究徐霞客家族和当时社会士人名流交往活动

① 任美锷：《徐霞客游记·前言》，《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8 页。
② 参见贺萧、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2 期，第 141—154 页。
③ 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 页。
④ 本文以《晴山堂法帖》（《石刻》的拓本碑帖集）作为引用文本，此本由薛仲良、吕锡生策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⑤ 陈仁锡：《晴山堂记》，《晴山堂法帖》，第 277 页。

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这些诗文原本是纸本手卷,在徐霞客母亲逝世后,徐霞客请工匠刻于石上,镶嵌在晴山堂内。

雅集诗文相会是明朝文人时尚,继承于前朝,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贯穿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石刻》就是证明。徐霞客祖上是官宦土地世家大族,《石刻》中自明代开国后长达近两百年的觞咏雅集,是这个家族社会文化地位的表征;在最后的阶段,即 1621 年以后,因徐霞客重新建构的家族社会文化关系网络而成型。

(一)对《晴山堂石刻》(94 件)进行分期:

1. 从明朝开国(1368)开始到正德十六年(1521)截止,共 52 件石刻,是徐霞客祖辈的内容;

2. 1521 年—1620 年是一个百年空白期;

3. 天启元年(1621)以后的内容,均为徐霞客所集刻,以晴山堂为主,女性即徐母进入中心,以徐霞客请人为徐母所画《秋圃晨机图》为题,相关诗文等达 34 件之多, 占据《石刻》的 1/3 以上, 无一不是出于士人名流之手。这些图文,是徐母 80 高龄的生存状态写照,也是明末男性士人话语中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包括对徐父与徐霞客的记述与评价,成为对徐氏家族性别关系的全面纪录。

(二)徐氏家族社会文化网络的构建:

此《石刻》,书法学界视为"与唐碑宋碣并重",统计《石刻》中包括有明朝状元 8 人、首辅 9 人、尚书 23 人,国子监祭酒 7 人,其中著名书法家 31 人。① 徐霞客将祖上的吟咏雅集活动继承下来,现《石刻》中保存天启元年(1621)年以后名人名士 39 人诗文墨迹,现依出版次序,列为下表:

姓名	出身简介	在《石刻》的名目
陈继儒	著名山人	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李东阳撰文壁书徐一庵(颐)墓志铭跋
张大复	名士	秋圃晨机图记
张鲁唯	万历进士	书上记
李维桢	隆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秋圃晨机图引
李流芳	举人,名士	书上引;并题晴山堂卷诗
何　楷	天启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题秋圃晨机图诗
杨汝成	天启进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姜逢元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题秋圃晨机图诗
米万钟	万历进士,书画名家	祝徐太君寿诗
张瑞图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入阁	观秋圃晨机图诗
张　燮	举人,名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李　宓	名士	书上诗
曹学佺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题秋圃晨机图诗
黄克缵	万历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题秋圃晨机图诗
林	万历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入阁	题秋圃晨机图诗
刘若宰	崇祯状元	题秋圃晨机图诗
何乔远	万历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	题秋圃晨机图诗;张侯名宦汇纪序
郑之玄	天启进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文安之	天启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	题秋圃晨机图诗
曾楚卿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题秋圃晨机图诗

① 汪小玲:《〈晴山堂法帖〉与徐氏家族"觞咏雅集"活动》,《中国书法》2016 年第 5 期,第 57 页。

续表

姓名	出身简介	在《石刻》的名目
高攀龙	万历进士,名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文震孟	天启状元,文徵明曾孙,官至礼部尚书,入阁	题秋圃晨机图诗;书陈继儒: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跋黄道周赠徐霞客诗稿
沈应奎	举人,名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孙慎行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书上诗
张育葵	崇祯进士	秋圃晨机图咏
谢德溥	天启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秋圃晨机为徐孺人赋并赠霞客北游
方拱乾	崇祯进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朱大受	崇祯进士	题秋圃晨机图诗
黄景昉	天启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入阁	题徐仲子贤母传略
夏树芳	举人,名士	秋圃晨机赋;晴山堂记
陈仁锡	天启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李东阳撰文壁书徐一庵(颐)墓志铭跋;题徐霞客盘山之游记
范允临	万历进士	题晴山堂卷诗
董其昌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
周延儒	万历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入阁	题豫庵徐翁像
蒋英	万历进士	徐母赞
王思任	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徐氏三可传
黄道周	天启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南明入阁	同徐振之泛舟洞庭即席分韵共赋;灯下依韵和徐振之;赠徐霞客诗
郑鄤	天启进士	黄石斋赠徐霞客诗稿跋
项煜	天启进士	黄石斋赠徐霞客诗稿跋

根据粗略统计,上表 39 人中,有 3 名状元,32 名进士,4 名举人,3 名无功名者,均为当时名士。其中不乏高官:礼部尚书 10 人;刑部尚书 1 人,户部尚书 1 人,工部右侍郎 1 人,国子监祭酒 4 人,入阁者达 5 人之多。名列东林的共有 8 人留下墨宝:高攀龙、孙慎行、文震孟、郑鄤、米万钟、姜逢元、黄道周、陈仁锡。此外东林名士缪昌期、钱谦益也与徐霞客有所交往。这些声名显赫的士人名流与徐霞客的交往,与徐霞客是江南世家子嗣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徐霞客的奇人奇志相关,这一点颇值得我们回味。

《石刻》内容极为丰富,是当时士人社会交往的真实写照。特别是通过对《秋圃晨机图》的题跋、诗文,以及所撰徐霞客母王孺人传等资料的分析,可以揭示中国古代性别与社会变迁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揭示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以后,经济货币化全面展开,对于江南世家大族生计的变化、特别是社会性别地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孕育杰出地理学家徐霞客诞生的前提条件。同时,笔者认为在市场化、商业化的社会大潮中,在家庭技艺转化为社会化、商业化技术过程中,伴随着女性在家族主导地位的出现,妇女发挥了主体积极作用,对于家族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包含了价值观的重塑;而社会变迁转型中的明末男性精英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如何评价这些变化的,均为下面着力考察的内容。

三、《晴山堂石刻》所见家族社会性别重构

今天,我们从游历四方的徐霞客,审视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及其蕴含的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但是,作为当事人本身,他不可能有我们从后向前看的“先知之明”,合乎逻辑的说明是他选择的人生行为,与他的前辈行为有所不同,与同时代人也有所不同,因此才被同时代的士人称为“奇人”。以往一般学界的评价,大多是以他出身于诗书传世的江南大族,却没有走科举道路,而是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足迹遍

布大半个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他的性别出发,讨论他规避了家庭的责任,选择从事自己心仪的事情,成就了“奇人”的生活路径。他的这种不同凡响的变化从何而来? 应该与他的家族突破了模式化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说起,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晴山堂石刻》中找到主要线索。

《石刻》堪称时代性最可靠的文本。通过分析《石刻》文本中关于性别的种种角色定义, 可以进而探讨社会性别观念参与了建构女性社会角色的方式与过程;解读《石刻》文本及其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也可以揭示出女性在当时家族与社会的地位变迁,说明女性不再只是边缘人群。

就徐霞客家族而言,明代江南科举极为繁盛,影响了徐氏家族几代人。高祖徐经的科场案变故,使得这个世家备受打击。徐霞客的父辈已经开始绝迹科场。到徐霞客时,他不仅选择了放弃科举,而且摆脱了羁绊,走向了自然的追求,可以说是个离经叛道者。而他能够走向外部广阔世界,首先要有衣食足的家庭条件。

徐氏作为世家大族,广有田亩,富有义行,有敕书楼为证①;诗书传世,筑有“万卷楼”。其高祖徐经的友人钱福在《万卷楼记》中云:“兹楼也,储川岳之精,泄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奥,焕斗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视也。”②但是徐氏家族一直科举不顺利,祖上有捐资为官之例。先世徐颐为中书舍人,时人曾认为是“以财得官”。王琦《寓圃杂记》记载:“正统间,江阴布衣徐颐、常熟上舍魏两家甚富,必数(欲)得一京职。其时朝廷尚重名爵,徐谋于中官王振,魏恳于当道大臣,所费不赀,徐尤甚焉,后皆得为中书舍人。不久徐以党人罪归,魏稍迁主事,京师称为‘金中书’‘银主事’。③”徐霞客高祖徐经之入科场案,友人文徵明为之惋惜,曾慨叹“积货之嫌,足以扼其名位而已”。④ 后世江阴人张之纯也云“因其家富而诬之也”。⑤ 徐霞客高祖徐经在科场案后郁郁而亡,其妻杨氏为三子析产,徐洽分得田产 12597 亩⑥,曾捐资入鸿胪序班,官至鸿胪寺主簿。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杨氏析产中的白银货币占有一定比例:“一,贴洽起造房屋银四千两,补聘室茶礼银四百,共银四千四百两,未曾付与,待后收大家租,易银付还”“一,贴沾起造房屋银四千两,补娶室银二千四百两,入学银七百五十两,共银七千一百五十两,未曾付与,待后收下大家租,易银付还”“所议贴补银两,待以后年分收下田租米麦,除办粮差食用外,共余米麦粜银补还洽、沾收领,满足之日,各照拨付”。⑧ 这里说明土地析产外,给儿子徐洽、徐沾作为补贴的部分,都是以白银来交付的,而白银是田租米麦在粮差、食用以外的出卖所得。

徐家经历了著名的科场案以后,徐洽仍沉迷于科举,特地在江阴马镇南旸岐筑书屋,即胡庄书屋,让儿子衍芳(徐霞客祖父)终年读书其中,却也是累年不中。到徐霞客父徐有勉一代,兄弟六人分的田亩无多,“家已中落”。⑨ 徐霞客母亲王氏自称“布衣妇”,需要“俭口损腹”⑩,也就是省吃俭用生活。徐霞客之父生前“不事纤啬”,“偶泛海出游”,主要靠其母“拮据修息”,使家业“蹶而复振”,“竟复旧观”。⑪ 如何“竟复旧观”的? 天启四年(1624)徐母 80 大寿,徐霞客请苏州张灵石、无锡陈伯符为母合作一幅

① 王直:《敕书楼赞》,《晴山堂法帖》,第 72 页。

② 吕锡生主编:《徐霞客家传》,《徐霞客直系先世传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 页。

③ 王琦:《寓圃杂记》卷十,明钞本。李东阳为徐颐作墓志铭,记非“以党人罪归”,而是得疾告归。

④ 文徵明:《〈贲感集〉序》,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第 1 页,《徐霞客游记》下册《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张之纯:《晴山堂旧跋》,《晴山堂法帖》附录一,第 409 页。

⑥ 《徐霞客家传》,《民谱》卷五十六《杨氏夫人手书分拨》,第 113 页。

⑦ 《徐霞客家传》,《徐霞客直系先世传述》,第 22 页。

⑧ 《徐霞客家传》,《民谱》卷五十六《杨氏夫人手书分拨》,第 117 页。

⑨ 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晴山堂法帖》,第 305 页。

⑩ 王思任:《徐氏三可传》,《晴山堂法帖》,第 329 页。

⑪ 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晴山堂法帖》,第 305 页。

《秋圃晨机图》,描绘了母亲王氏凌晨在豆棚藤蔓下勤劳纺织的情形,从此图与当时士人给予他母亲的“机杼一生修世业”的评价①,我们可以得到解释。其父死后,由他的母亲主持家务,带领婢女等织布不辍,其母云:“今里媪之织者无数,而吾家特以精好闻。”②“织者无数”点出了社会环境背景,而她家织布“特以精好闻”, 士人诗文多有称赞之辞,“其织布也,与缣讼价,缣反输其轻妙”③,“拟赛齐纨卑蜀橦”④,赛过了山东细绢和四川木棉布;更重要的是,此布“持向吴门货吴侬”⑤,就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不仅出卖,而且徐家布还在市场上享有“素丝见名门”的美誉⑥,远近知名,“轻弱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⑦ 可见当时徐家已经以手工作坊作为家庭重要生活的来源之一;由于有了手工业作坊,所以徐家才有中兴,结束了分家之初“枵腹约口,始有　廪”⑧的状况,乃至遇到荒年,王氏还命徐霞客岁以数十石粮救济灾民。⑨ 至此,徐氏望族结束了连续四代的科场悲剧,完全摒弃了科举追逐,也正是在这一代,徐氏家族开始了不单靠田亩过活,而选择以经营织布作坊为经济来源之一的生活方式,这构成了晚明这一世家不同以往的重要变化。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变化,徐霞客的抱负“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⑩,才能够得以实现。徐霞客走遍大半中国,主要因为他家有一个家庭手工织布作坊,由他的母亲带领家族妇女与婢女进行生产,除了田亩外,加上织布收入,才有财力提供徐霞客长年出门远游之资。此外,徐霞客出游有典卖田产的纪录,更说明其家后来主要依靠其母经营的纺织作坊为主要生业。

将家族研究置入宏阔的时代背景中,可能更有收获。晚明白银与全球发生了互动关系,牵动了中国市场的全面勃兴,促使明末江南工商业发达。由此背景看徐霞客的思想意识渊源,主要是家庭经济来源的变化,引发了家庭性别关系的变化。徐氏家族经济来源的重构,是家族性别地位重构的逻辑出发点,并导致了家族价值观的重塑。

徐霞客出生在胡庄书屋,霞客族兄徐仲阳说霞客“性酷好奇书,客中见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⑪。而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却不仅是与书籍为伴,而是超越了书本,走上了与自然相伴的求知新路。这正是他为同时代人称“奇”之处。这种选择与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说来,明末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徐氏家族这一传统诗书传世的江南世家大族,在晚明发生了重大变迁:不仅在家族经济上从广拓田亩的世家大族,转变为以织布作坊为主的新型经营者;而且因家族经济转型,其母王孺人“久支门户”,徐氏家族的掌门人发生了性别的转换,从男主家族生计转至女主家族生计。女性承担起养家的重担,男性可以自由地解脱家庭羁绊,走向外面的自然世界。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显然是非传统的。而这种经济转型与家族权力地位的性别转换紧密相联系,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财富由土地为主,转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社会转型态势下,对于传统家族深刻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是东西,是一种社会关系。”⑫发展至晚明,随着贵金属白银成为社会上

---

① 文震孟:《题秋圃晨机图》,《晴山堂法帖》,第 238 页。
② 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晴山堂法帖》,第 316 页。
③ 王思任:《徐三可传》,《晴山堂法帖》,第 333 页。
④ 何乔远:《题秋圃晨机图》,《晴山堂法帖》,第 222 页。
⑤ 何乔远:《题秋圃晨机图》,《晴山堂法帖》,第 222 页。
⑥ 刘若宰:《题秋圃晨机图》,《晴山堂法帖》,第 218 页。
⑦ 陈继儒:《豫庵徐公及配王孺人传》,《晴山堂法帖》,第 354 页。
⑧ 陈继儒:《豫庵徐公及配王孺人传》,《晴山堂法帖》,第 351 页。
⑨ 陈继儒:《豫庵徐公及配王孺人传》,《晴山堂法帖》,第 355 页。
⑩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91 页。
⑪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90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19 页。

流通的主币,明代白银货币化伴随着赋役改革全面铺开,白银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都卷入了市场之中,在社会经济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日益与每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中国传统社会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晚明社会出现了重要的变迁迹象,标志着中国与全球同步,正在走向近代社会。①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才可能诞生了一个在明末被士人名流称为"奇人"、又被今天学界评价为"现代地理学先驱"的徐霞客。

有学者指出:"从徐氏家族经济变迁转折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徐家经济的盛衰转折点是徐霞客的高祖徐经,正是从他开始家族经济及命运日渐衰变与萧条,最终沦为织布之家。"②这是将徐氏家族经济变迁的实质性因素都归之于政治科场案。对此笔者不能赞同,仅从政治上不能完全说明家族经济的衰落和变化。家族经济变迁受到晚明社会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更大。根据吴承明先生的统计,1551 至 1600 年,徽州地价曾出现跌落半个世纪的现象,跌幅高达 40%,他认为"这需寻求解释"。③ 实际上,白银货币的冲击可以说是最合理的解释之一,当时正处于白银货币化趋向明显、加速发展之时,地价跌落与白银货币化过程加速的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成为主币,田亩退居其次,这与白银货币化加速发展、白银成为社会财富象征有着密切关联。成、弘以后,人们缴纳赋税中的白银日益增多,以银代役逐渐增加,至嘉靖初年一条鞭法开始实行,这种社会现实,使得晚明家庭越来越需要白银维持家庭开支,不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等需要白银,而且更重要的是交纳国家田赋与徭役都需要白银。土地不能直接提供白银货币,而来自土地的田赋与徭役却越来越多的以白银来征收,家庭手工业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遂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纺织业是明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明初开始推行强制性的植棉政策,从此棉花种植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普及性的推广与发展,大面积的棉花种植为江南地区棉纺业商品性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徐霞客的家乡江阴所在的江南地区,是明末商品货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家庭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张居正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法令,但是有清丈全国田亩之令,土地清丈后按田亩征收税银,官府需要差役出银雇募,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统一征银水到渠成。白银货币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晚明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在江南并不是个别现象。有人记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④苏州地方官曹时聘奏疏中云:"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⑤南直隶一带"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故贾人几遍天下"。⑥ 晚明江南家庭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交纳白银赋税,依靠家庭纺织谋生度日的家庭,比比皆是。如英国学者白馥兰所说,"纺织品生产在中国原本被看成是一个女性的生产领域"⑦,晚明江南棉纺织业发展,棉纺织深受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拥有比丝绸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有"衣被天下"之称,主要是建立在家庭手工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主要生产者是妇女。"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

① 参见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② 蒋明宏:《徐霞客与"李约瑟难题"》,《浙江学刊》1992 年第 4 期,第 98 页。

③ 吴承明:《16 与 17 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12 页。

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85 页。

⑤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钞本。

⑥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第 83 页。

⑦ 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帝制中国晚期的权力经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1 页。

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①以上记载虽然说的是松江情形,但是用于南直隶常州府江阴也是切合的。据《阅世编》记载,江南地区纺织品市场发展繁荣,“官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② 经济货币化的浪潮席卷晚明社会,对江南地区传统农本为主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极大冲击,导致江南地区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同时市场流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商品从以剩余农产品为主,全面转向农家生产与生活资料等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为主,促进了家庭手工业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徐母所云“今里媪之织者无数”当非虚语,妇女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在市场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同时,女性没有游离于发展的市场经济之外,在江南市场发展中,妇女的纺织经验丰富、技术熟练,担负了重要角色,这也为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化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在晚明这个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江南棉纺织品生产对于性别行为模式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徐氏家族清楚地反映了出来。

事实上,缴纳赋税外,晚明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白银货币紧密联系着,加剧了市场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以田亩粟帛为财富的观念随之改变,以白银货币为财富代表的观念逐步形成。如明人于慎行所述:“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③观念转变反映在江南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兴起、商业行为的急剧增加上,反映在地价上,更反映在人们家庭性别关系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

通过对于《晴山堂石刻》的剖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以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货币化接轨,对于江南世家大族生计的变化、特别是家族社会性别地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展现了明代中国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成为孕育杰出地理学家徐霞客诞生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在市场化、商业化社会大潮中,在家庭技艺转化为社会化、市场化技术过程中,伴随着女性在家族主导地位的出现,妇女发挥了主体积极作用,对于家族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包含了价值观的重塑。

四、《晴山堂石刻》中的虚与实

社会性别关系是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家族的这种性别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这里凸显了性别关系的经济本质,在家族中,两性共同塑造了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不可孤立地看待。

每个时代的人们对待生活都有自己的选择与态度,改变着固有的思维定式。除了生存,还有社会文化需求。为了经济利益,诗书传世的世家大族,开始经营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的产品投入市场,这是服从社会商业化需要作出的选择。以当时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去理解当时人的行为,《石刻》反映了明末语境中当事人的立意与行为。作为明末士人名流的集体记忆,《石刻》反映了男性士人对于性别的观察视角。《石刻》中的性别描述,无疑是笼罩在男性精英士人话语下的生成物,分析《石刻》这一文本,具有虚与实的两面性,其文字书写也折射出了社会变迁与历史书写的吊诡,印证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错综复杂,包含多种面相和声音,其中既有新的近代因素,又有传统因素的存在。《石刻》的明末部分,主要是徐霞客为其母王孺人 80 寿辰所征集的当时士人名流诗文等,是徐氏家族两性关系相互塑造的一个例证。对徐氏家族的还原式剖析,可以使我们重新省思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联,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晚明社会性别变化的形成及其对于家庭成员的重大影响。下面具体钩沉《石刻》中所见,进一步分析其反映性别关系的丰富内涵。

---

①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明刊本。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7—158 页。

③ 于慎行:《谷山笔　》卷四《相鉴》,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9 页。

(一)《石刻》中的徐母形象: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记述了徐霞客的话:“吾翁豫庵公捐宾客者二十年,独母王孺人久支门户,课夕以继日,缩入以待出……母无他好,好习田妇织,又好植篱豆……绿荫蔽日,辄移纬车坐其下。”①说明在徐霞客的父亲死后二十年间,由他的母亲独自支撑门户, 勤俭持家,而谈及“母无他好,好习田妇织”,在今天看来,却是隐去了母亲以纺织苦心支撑家业的现实。而徐霞客在外游历“不敢食酒噉肉,非特恐点山灵,要亦念母氏三十年辛勤饭蔬故也”②,他是深知母亲“归来万里一庭秋,机中母发如积雪”③的辛苦的。

诸多诗文是专门关于《秋圃晨机图》的,徐霞客曾遍请同邑名人为此图作序题诗,以后又广邀东南名士为之题诗,一并刻石存入“晴山堂”内。这幅图虽然现已不得见,但是从题名可以略知图像中徐母的形象:秋日晨起,豆圃架下、织机上的徐母,题诗文字中更有徐母形象的完整表述:

> 君家阿母凌晨起,纬车独纺秋阴底。④
>
> 吾闻东海有贤母,不以春园艺秋圃……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⑤
>
> 母性恭俭,好率婢子鸣机杼……母心怜振之负绝特之才,不能俯仰自樊于时,其于天地之穷际,则何不至焉。乃稍稍具粮糗,令振之周览名山大川,有以自广。曰:“凡圣人所为戒远游者,其子母之识力,不相信也。吾无汝虑,盍往乎?”振之则请受约,无下及约而返。如是者率以为常,凡二十年,而振之之双屐,遂遍天下。⑥
>
> 则孺人之操家秉,与徐君之奉孺人,盖相与以有成焉。宜陈仲醇详叙之,而诸名公歌咏累累也……乃孺人自夫子豫庵公捐馆舍以后,内外家政,一切受成,处置井井,靡所不当;而性故好艺植、好纺绩……凌晨起,取纺车置篷下,豆实垂垂,机声轧轧,数十年如一日也。克勤克俭,是为家法。代夫以父其子,代妇以子其孙,代子以克其家。评曰:是母是子,其相与以有成者,岂在世俗之间哉! ⑦

综上可见,士人名流对于徐母“机杼一生修世业” ⑧的评价甚高,如“千载彤史间,于焉庶俦匹。”⑨这里主要是从传统女性美德出发给予评价与夸赞的。徐母出生于江南书香门第⑩。徐母作为一位家庭纺织能手,世家大族的主母,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晨上织机,完全符合传统对于女性勤俭持家的行为规范,被士人名流誉为勤俭持家的美德代表,得到了赞颂。在时人评价中,充满了道德伦理的因素,却多少淡化了徐母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家庭生计所付出的艰辛,消解了女性在市场化大潮中的身份价值。如果说徐家上代居寡的杨氏有析产的权力,到了王孺人一代,则已不仅是执掌家族内部事务的权力,而且是直接经营家庭手工作坊,与外部市场发生关联,并以此作为家庭生计主要来源之一,也就是养家的责任。这是时代赋予了女性以新的特质。徐母承担了家庭重担,包括将家庭中男性与女性所要承担的责

---

①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晴山堂法帖》,第 150—151 页。

② 陈继儒:《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晴山堂法帖》,第 355 页。

③ 沈应奎题,孙慎行书,《晴山堂法帖》,第 240 页。

④ 杨汝成:《秋圃晨机为徐太君赋》,《晴山堂法帖》,第 195—196 页。

⑤ 高攀龙:《题秋圃晨机图》,《晴山堂法帖》,第 233—235 页。其中“杼声似写丸熊苦”句,引用了唐代柳仲郢母的贤母教子典故。

⑥ 张大复:《秋圃晨机图记》,《晴山堂法帖》,第 169 页。

⑦ 李维桢:《秋圃晨机图引》,《晴山堂法帖》,第 183—187 页。

⑧ 文震孟:《题秋圃晨机图寿徐母王孺人》,《晴山堂法帖》,第 238 页。

⑨ 张瑞图:《观秋圃晨机图诗》,《晴山堂法帖》,第 205—206 页。

⑩ 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记:“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264 页。近年江阴徐霞客研究会研究人员陈锡良发现,徐霞客母亲王氏的出生地,就在徐霞客镇璜塘东常村,离徐霞客故居南旸岐仅五里左右。新修《东常王氏西沙宗谱》记载璜塘东常村有位王诗,出身书香门第,耕读世家,字子删,号成东,生卒于嘉靖年间,妻子为华氏(无锡县人),有五个儿子。最终认定王诗就是王孺人的父亲,徐霞客的外祖父。见宋超、弃疾:《徐霞客母亲身世浮出水面 徐母出生在璜塘东常村》,中国江苏网 2014 年 11 月 27 日。

任全部担承下来,儿子多年出游在外不归,年迈母亲在家中久支门户,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丝毫的诉苦,传统女性美德在这里确实体现到了极致。

当士人在谈论徐母形象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按照一套传统意义来理解家族中的女性,并没有加入新的意涵,在此士人话语所生产的是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似乎在当时市场化语境下没有产生新的观念和规范。追寻这些评价基于怎样的思维框架? 应即传统的"男耕女织"。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工方式,从南宋楼　绘制《耕织图》,出现了男耕女织形象的描绘。吴承明指出:"男耕女织是一种自然分工,即在生理基础上的分工","随着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原始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传统的犁耕农业,同时有了纺织。从此,农业转入男子之手,开始了男耕女织,这种转变,也引起了原始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① 李伯重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传统"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模式虽早已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直至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农家男子脱离纺织而全力耕作,和妇女脱离劳作而趋向专门育蚕纺织的现象才日趋明显,即所谓有"男耕女织"②。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明代出现的这种变化现象,特别是"女织",在当时已经发生了内涵的演变。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女织"在晚明时代与以往的"男耕女织"已经迥然不同。以徐霞客家族为例,徐母的"女织"行为,已不是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可以解释,而完全是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周易·家人》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③这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在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理想田园风景中,女织是妇女勤俭持家的典型风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密切相关,因此"男耕女织"既是士人对太平社会的构想,又描绘了农耕社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发展到晚明,赋役制度的变化反映商品货币经济有了重大发展, 赋税由实物课征转向白银货币课征,徭役以银替代,形成明朝重要的财政体系转型进程,这无疑是走向近代的趋向。这种变化,根本改变了小农家庭的耕织经济格局,对农本经济结构产生了分解作用,对传统"男耕女织"模式形成了冲击,也使世家大族家庭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我们见到从传统文化角度对于徐母亲自纺织持家的称颂,也看到士大夫依据传统做出的评价,而徐家明明是依靠徐霞客母亲织布撑掌门户,却还有对她"积得金钱供布施""无与民争利之嫌"④的颂扬。毫无疑问,在明末士人眼中,看到的仍是徐母身上传统的妇女勤俭劳作美德,却难得在表述中看到徐母晨织的背后,白银货币早已将江南社会宁静的田园生活打破,徐母组织起家庭手工纺织作坊,从事商品生产,产品投入市场,完全是为了赚取白银货币维持家庭生计,"贸布以易糈",就是徐家需要将织布投入市场去换取口粮的最好说明。市场上充斥了商业竞争,徐家织布在市场上有口皆碑,可视为在市场竞争中的胜出,由此也充分证明了徐家日常生活主要依靠的正是徐母经营的手工业织布作坊。

我们从这些诗文中,唯见一派田园景观,距离残酷的手工业市场竞争现实似乎非常遥远。有学者认为徐母"与其说这是一种自觉的经济行为,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勤劳俭朴的伦理道德行为"⑤,我认为此说恰恰是为明末士人表面上的道德评价所误导了。

我们不能只取其表,不明其里。林　诗"延陵有贤母,殷殷勤作苦"⑥,何楷诗"八旬霜鬓白如银,不

---

① 吴承明:《论男耕女织》,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99—107 页。

③ 黄寿祺:《周易译注》卷五《家人卦第三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上册,第 214 页。

④ 黄克缵:《秋圃晨机为徐霞客母太孺人赋》,《晴山堂法帖》,第 212、213 页。

⑤ 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诸问题探析》,《中国农史》2006 年第 4 期,第 88—97 页。

⑥ 林　:《题秋圃晨机图》,《晴山堂法帖》,第 214 页。

向浓华老此身。四壁光余知恤纬,三冬蓄在岂忧贫。漫将古意存图画,聊与人间说苦辛”①,写尽了徐母支撑家庭的辛苦。而《石刻》中明显揭示明末社会现实的,是黄克缵《秋圃晨机为徐霞客母太孺人赋》:“方今海内民穷赋急,‘大东小东,杼轴为空’。读秋圃晨机诗,又为世道一致慨云。”②这里直接道出了当时社会“民穷赋急”的真实现实。实际上,万历二十四年(1596)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掠夺白银;万历二十九年(1601),太监孙隆到苏州勒索机户,扬言每机加增税银三钱,引发机户罢织暴动;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派出缇骑逮捕江南东林党六君子,其中就有《石刻》中的诗文作者高攀龙;苏州市民五义士带头起事反抗,后来助修五人墓的有《石刻》的诗文作者文震孟。江阴乡间早已不那么太平,从二十年前徐父被“盗贼”所逼的伤且死,已可得到充分的证明。

徐母经营的家庭手工织布作坊撑起了全家的生活,可以使儿子远游,从事自己心仪的事情,这是在晚明出现的新现象。我们知道,就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男性是一家之主,应该撑起家业的传统之说,两千多年来这一观念是普遍的性别认知。按照通常的观念,古代世家大族妇女不是应该在内宅活动吗? 即使参与纺织工作,也不会是从事投放市场的生产,而在 17 世纪初,徐氏这一世家大族之例证明,晚明社会性别分工及其观念的变迁,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美国彭慕兰教授曾全面探讨欧洲和东亚妇女的工作、家庭与经济发展,重点分析了欧洲和亚洲的不同性别在经济参与方面的灵活性,提出中国妇女担负着市场性生产和家用品生产的双重任务,而她们的这一角色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也指出:纺织品生产领域,妇女已经成为主力。但是, 妇女在市场化的纺织品生产方面不断增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男性就退出了这一领域。实际上, 男性把持着大多数不仅高级而且利润丰厚的奢侈品生产。③ 在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关于明末纺织业的部分所展示的内容,说明了男性在明代生产中突出的地位和作用④;英国白馥兰教授认为,纺织技术这一原本属于妇女的家庭技艺,“到明代后期,所有的纺织业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基本上变成了一种男性从事的职业”。⑤ 这一看法未免有些武断,她指出了家庭纺织业将随着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而面临逐渐被淘汰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妇女在传统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重要作用。徐母的例子说明,从性别、从家族、从社会来说,无论是身份、道德还是经济实力上,明末女性都参与到主流社会之中,社会处于变迁之中,江南世家大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家族中的性别角色也发生了转换,时代使徐母处于家庭的主导地位,她担当的是与男子同样的家族与社会责任,对她的肯定就是对主流社会价值取向的肯定。《石刻》表明了当时士人对于世家大族在社会中的经商行为,尤其是女性经商行为的实际认可。另一方面,《石刻》的诗文和墨迹等征集,说明徐霞客的游历行为也得到了社会士人的认可,由此重构了家族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也由此得到了维系,传统文化仍得到了传承。

(二)《石刻》中性别关系及其评价

士人对于徐霞客及其家族的评价,可以说明士人对家族性别关系的认识。

首先,就主流文化而言,当时读书人的出路是科举,徐霞客无疑是另类。根据《石刻》,徐霞客家中有万卷楼,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先是“肆志玄览,尽发先世藏书,并鬻未见书”,随后是思考“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于是“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⑥ 具有突破传统的勇气,“放绝世

① 《晴山堂法帖》,第 189—190 页。

② 《晴山堂法帖》,第 213 页。

③ 阿吉里、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编著,马援译:《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50 年为视角》第四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3—169 页。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95—96 页。

⑤ 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帝制中国晚期的权力经纬》,第 139 页。

⑥ 吴国华:《徐霞客圹志铭》,《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88 页。

务,喜游名山”①,徐霞客成为中国理性求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第一人。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 17 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 20 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如梯、坪等,这些专门术语扩大了普通术语的含义,对于每一种东西,他都用步或里把它的大小尺寸详细地标记出来,而不使用含糊的语句。”②徐霞客的人生选择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今天来看,徐霞客走向自然取得的考察成就,得益于他的重实地考察的科学方法,这种从自然现象运动及其相互联系中去把握事物本质特征的方法,反映了注重实际验证的近代科学的特征。

对于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当时人如何看待?陈继儒说他“酷好异人异书”,“而不屑谒豪贵,博名高”。③ 陈仁锡云他“负奇骨,不与俗同”。④ 钱谦益评价说:“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⑤ 黄道周云:“真古今第一奇人也”。⑥ 夏树芳曰“盖也当世一奇男子也”。⑦ 陈继儒言:“余欲列之《奇男子传》中者也。”⑧文震孟说:“即不能如仁兄五岳之游……尽可自我”。⑨ 黄道周感慨云:“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⑩说明徐霞客放弃科举而走向自然,走向自然,他的特立独行为士人所传颂;融于自然,更是在当时已为士人所称赞。在《石刻》中,一方面,士人以传统眼光评价母亲的纺织人生与勤俭持家;另一方面,对于儿子特立独行的人生给予赞赏,这使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多元包容有了新的认识。

陈继儒记载徐霞客能够实现他超脱世俗的志趣,与徐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往徐君放绝世务,喜游名山,游必咨母命而后出。”当徐霞客远游归来时,王孺人笑迎曰:“儿无恙。吾贸布以易糈,摘豆以佐酒,卯孙从旁复诵句读以挑汝欢,吾母子尚复何求哉?” 儿子远游归来,徐家卖布到市场购得粮食,自栽豆类以下酒,好一幅家庭的和睦生活图景。他引用了《国语》中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故事 ⑪,以传统女性美德来称赞徐母。

董其昌记:当徐霞客束装待发,面露依恋之意时,其母“察其意,慰之曰:吾幸健,善饭足恃耳。男子生而射四方,远游得异书,见异人,正复不恶。无以我为念”,因此他称“故仲子足迹,几所谓州有九,游其八者,孺人成之也”。⑫ 徐母亲制“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 ?”⑬这不仅是徐母对“父母在,不远游”传统家庭伦理的背离,更是重塑了儿子的人生价值观,成就了儿子超越世俗的志趣和奇特的生活轨迹,促成了徐霞客自 22 岁到 55 岁这三十多年的游历半天下,被时人称为“奇人”,被后世称为“科学的拓荒者”的人生。

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记徐氏母子间的理解情深:徐霞客为母罢游归家,母为他再出游,不顾 80

---

①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晴山堂法帖》第 153—154 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5 卷,北京:科学出版杜 1976 年版,第 62 页。
③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晴山堂法帖》,第 164 页。
④ 陈仁锡:《晴山堂记》,《晴山堂法帖》,第 287 页。
⑤ 钱谦益:《嘱毛子晋刻游记书》,《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86 页。
⑥ 黄道周:《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61 页。
⑦ 夏树芳:《秋圃晨机图赋》,《晴山堂法帖》,第 261 页。
⑧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晴山堂法帖》,第 164 页。
⑨ 文震孟:《寄徐霞客书》,《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83 页。
⑩ 黄道周:《狱中答霞客书》,《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84 页。
⑪ 陈继儒:《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晴山堂法帖》,第 158—159 页。
⑫ 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晴山堂法帖》,第 308 页。
⑬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游记》下册,第 1191 页。

高龄,陪他同游句曲、荆溪。陈氏不禁感慨道:“是年仲子始罢游,孺人始偕游。罢游惧伤亲之心也,偕游惧伤子之心也”;“自古奉其亲者多矣,奉山水自徐仲子始。奉富贵而不受,古贤毋有闻矣;奉山水而受,从徐仲子之母始。山水品人物多矣,以是两高其母子,自余志王孺人始”。

王思任的《徐氏三可传》,更是将徐霞客父徐有勉、母王孺人与徐霞客放在一起加以评价赞誉。其父“寓园以自隐。或讽之仕,掉头不答也”,其谓子曰:“读书好客,可以竟吾志,不愿而富贵也”;“弘祖有五岳之志,母为束装。戒之曰:第游名胜,归袖图一一示我。游未竟,我不啮指,去亡害”;“余邂逅徐仲子,一接谈而神与陆吾俱邈矣。”①徐霞客出游,有其父的遗风,有其母的愿望,更是他自己超凡脱俗的选择。

从《石刻》看,在传统基础上士人建构的男女性别规范,在市场化大潮来临时,对于女性参与到社会和市场之中被赋予的意义,没有彰显出来;但是仔细分析,徐氏家族却也朦胧地显示出一种新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性别规范,也就是社会是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而家庭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表面上沿袭了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于男女社会空间的二元区分,却不再以男女之间在家庭内外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是具有了现代性意味的以个人情感满足和自我实现为基础。

特定时代产生特殊人物,徐霞客作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先驱,方豪先生曾就他与西洋教士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却没有找到直接接触的联系。② 徐霞客产生在本土的土壤中,作为晚明社会文化变迁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可以说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位士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士人。进一步探讨,徐霞客的行为与全球化开端有关乎? 无关乎? 说有关,他的游历人生与其家依凭安身立命的家庭手工作坊产品投放市场交易紧密相连;说无关,则又与唯利是图的西方探险迥然不同,在一个处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以求知与求利结合的探险者众,而徐霞客却独辟蹊径,惟以求知为怀,何其难能可贵。

徐霞客其人其事虽奇,当时士人阶层并没有以其为非,说明晚明社会士人思想观念已发生变化,无论是对于工商业经营,还是对科举之外多样士人行为的包容,都构成了观念发生变化的例证。然而,我们还看到,即使是有着传奇人生的徐霞客,在生命的最后也曾发出过迷茫的声音,临终前说出“大丈夫当奋志勋名……奚以此区区者为”,又为长孙生辰喜逢五位翰林信函同日到来, 题其小名为“五翰”,“谓是儿必能光大吾家”。③ 表现出对于儿孙前途回归科举传统的微茫期盼。而《石刻》的收集刻石,更是对于家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行为, 这也许可以说明他最终还是无法完全超脱时代,也可能这就是前辈学者所探讨的徐霞客之后再无徐霞客的缘故之一吧。

从徐霞客家族的性别关系及其士人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人从传统中走出,但仍不能摆脱传统。这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的应有之义。传统和近代不可截然两分,二者交融在一起,是晚明社会转型中性别文化变迁的特性。

结 语

明代白银货币化为社会变迁转型提供了前提,徐氏家族经济的变化,与明朝赋役—财政改革,白银成为国家法定的财政征收形态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到明末,白银货币化已经基本上完成,无论国家田赋还是徭役,都已经不再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征收和负担,因此才可能产生家庭手工业成为主要家庭生计

① 王思任:《徐氏三可传》,《晴山堂法帖》,第 330—342 页。

② 见方豪《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的初步研究》一文,论及在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并无一人与徐霞客谋面,也没有一人进入徐霞客的《游记》。但是,通过明末清初种种社会关系和文献,他说明:“似不能不受西洋科学之影响,而与当时之西洋教士不能无间接之关系”,结论是:“吾人今日初步研究所得,霞客与西洋教士之关系,虽只以间接者为限,然谓其有直接关系,亦颇可信也。”(竺可祯等:《地理学家徐霞客》,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11—24 页)

③ 缪诜:《廪彦范中公传》,吕锡生主编:《徐霞客家传》“第十九世·徐建极”,第 238 页。

来源,而女性成为家庭生计主要担当者的性别身份转换。性别史强调女性作为主体创造了历史,将性别视角纳入晚明社会变迁转型的讨论范畴之中,可以使历史事实的阐释更富有张力。在晚明社会中,女性不再只是边缘人群;在家族中,女性拥有了主导地位,有了话语权,并影响了家族男性的人生选择,由此才产生了视“力耕奉母,践更徭役”为“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飏去” ①的徐霞客,可以不走传统老路,成为“飏去”的“奇人”,体现了一种颠覆传统的近代理性文化追求。徐氏家族的个案,为我们从性别视角认识晚明社会变迁与转型,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明代白银货币化,对于晚明江南家族性别地位、生活方式的变化,价值观的重塑,以及家族秩序的重新构建,均有深刻影响。而这一传统家族的变迁,是晚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缩影,也是全球化开端历史的一部分。

Silver, Gender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aking Xu Xiake's Family as an Individual Case

Wan 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social change, the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which was part of the global history. Similarly, social gender underwent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aking the Xu Xiake's (徐霞客) family as an individual case, and using the Xu's Qingshantang Stone Carving (《晴山堂石刻》) collected by and carved under the charge of Xu Xiak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is an existing collection of 76 items of carvings with 94 inscriptions of proses and verses by the then literati), this essay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modeling of social gend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appearance of Xu Xiake as a celebrity,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social change by the famous literati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new wide mode of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deep influence of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make a further study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ilver monetization, social gender, Xu Xiake's (徐霞客) family, Qingshantang Stone Carving (《晴山堂石刻》), late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钱谦益:《高士霞客公传》,吕锡生主编:《徐霞客家传》“第十七世·徐弘祖”,第189页。